

明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析论

杨新勋*

〔摘要〕 明嘉靖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是以元十行本之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加以改造、完善刊刻而成,在经籍史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版式、行款方面作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形成半叶九行,经文单行大字、注文单行中字、疏文双行小字,且领起大“注”字、大“疏”字均黑底白文外加黑圈的格式,经、注、疏区分显明,体例完备;二是对元十行本原版和明正德、嘉靖修补版均作了较为全面的校改,补脱删衍,改正讹误,成绩较为突出;三是此本也出现了不少误刻和误改,其误改往往据文意和文例,不易发觉。李元阳本对此后的北监本、毛本、殿本、库本和阮刻本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李元阳本;嘉靖重校修补本;校正;误改

明嘉靖年间李元阳以御史巡按福建,与时任福州府学佾事的同年江以达主持刊刻了《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人称“李元阳本”“嘉靖本”“闽本”。李元阳本对后世经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万历年间李长春主持北京国子监刻本(简称“北监本”)即以此本为底本,之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刻本(简称“毛本”)、清乾隆初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又以北监本为底本,均可溯源于李元阳本。李元阳本对阮元重刊本《十三经注疏》也颇有影响。但有关李元阳本尚有一些未明之处,本文从《论语注疏解经》入手作一管窥,期有补焉。

一、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的刊刻底本

学界一般认为李元阳本的刊刻底本是十行注疏本,但十行本有宋刻本、元刻本之别,元十行本又有初刻原版和明代修补本的差异,其中明代修补前后至少有五次之多。那么,李元阳本所依据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

《论语注疏解经》无宋十行本传世,今存十行本均为元刻明修本,其中单行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简称“国图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明正德修补本(简称“台湾‘国图本’”)和元刻明修本,^①汇印本有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元十行本汇印《十三经注疏》之原刻无存者,今存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10097。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邢昺《论语注疏》整理与研究”(15YJA720012)阶段性成果。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仅著录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又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明正德修本的缩微胶卷,由于拍摄时间较早,字迹反较今台湾藏本清晰。

者即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北京市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各藏一部，《中华再造善本》据北京市文物局本影印，本文据《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本论述。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版心的标记，可知元十行本在明代至少经历了正德六年补版、正德十二年补版、正德十六年补版、嘉靖三年补版和嘉靖重校修补五次有明确标记的修补，其中《论语注疏解经》有正德六年补版一叶、正德十二年补版五叶和嘉靖重校补版九十四叶，另有两叶可推断为正德十六年补版。国图本和台湾“国图本”均为正德十六年补版本，与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相比，正德年间的三次补版均相同，但没有嘉靖重校补版。另外，台湾“国图”还藏有一部元刻明修本《论语注疏解经》，此本与北京市文物局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解经》属于同版。^①

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正德年间的三次补版与元十行本版式略有不同，元十行本多白口、左右双边，补版或四周单边或四周双边，或黑口或白口，或单黑鱼尾或双黑鱼尾，正德六年补版版心中间刻誊抄人，但与原版最大的区别是版心上方刻补板时间，有“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和“正德十六年刊”三种，至于说到版内文字和行款、体例几无二致，说明补版本身没有划一意识，与原版也无明确的区别意识。三次补版均有些墨钉，说明元十行本板片至明正德年间已有破损，补版也只好阙如。嘉靖三年补版有刊刻时间标记的仅两叶，另外一叶也可以推测为此年补版，其版式略同正德补版。

嘉靖重校补板与以上四次补板有所不同：①版式统一为四周单边，白口，对双黑鱼尾，鱼尾上下有黑线。②版心上方刻校者，共有“怀浙胡”“闽何”“候番刘”“府舒”“候吉刘”“怀陈”六人；版心中间刻书名简称和卷次，如“诗疏卷十二之二”“语疏卷二”等，之下有的刻“乡林重校”或“林重校”，“林”当即“乡林”之省；③版心下鱼尾下刻叶码，版心叶底刻刊工名。④经注与疏文之间所标领起的大“疏”字均作黑底白文，外加黑圈，③十分醒目。④重校补版大字正方，小字略长方，与元十行本和正德补版相比刻字稚拙呆板且字体略大，挤满了版面。⑤重校补版文字清晰，很少墨钉，而且还改正了元十行本不少文字讹误。如《论语注疏解经》卷五“赐也何如”章疏文“此夫子又为指其定分”，元十行本原版“夫子”误作“未子”，嘉靖重校补版更为“夫子”；同卷“子使漆雕开仕”章疏文引“子使漆雕开仕”，元十行本原版“仕”误“化”，嘉靖重校补版更作“仕”；卷六“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章疏文“颜回任道”，元十行本原版“颜”误作“闻”，④嘉靖重校补版更作“颜”；卷七“志于道”章疏文“覆幬持载”，元十行本原版“煮”误作“寿”，嘉靖重校补版更作“幬”；⑤同卷“二三子以我为隐乎”章包注“圣人知广道深”，元十行本原版“深”误作“探”，嘉靖重校补版更作“深”；等等。⑥对于要保留的元十行板和正德年间的三次修版进行文字校对，增补缺字，更改文字讹误。增补缺字，如《论语注疏解经》之首叶《论语序》为正德六年补版，疏文“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原“与”与“论”字均为墨钉，嘉靖重校修

①杨按：台湾“国图”藏元刻明修本《论语注疏解经》刷印时间应晚于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原因有二：一是此本与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补版相同版面的版心无刊刻时间和校人、重校人，补版版心上方大多改作黑口，如此修改版心颇有掩饰递补、冒充初刻之嫌，版心上方补刻时间自正德六年、十二年、十六年、嘉靖三年至嘉靖重校修补一脉相承，而台湾“国图”藏元刻明修本《论语注疏解经》改换版心说明其刷印时间要晚于嘉靖重校修补本；二是此本卷十五第九、十、十一这三叶为后来补刻（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三叶为元十行原版），顺双黑鱼尾，无刻工，字体近行书，字迹清晰，与元十行原版、明正德补版和嘉靖补版均不一致。

②偶有版心上方刻重校人而中间刻校人者，亦偶有将校人和重校人并作小字挤在版心上方者。

③杨按：宋八行本用黑底白文（无黑圈）的大“疏”字区分经注和疏文，元十行本《周易兼义》区分经注与疏文的大“疏”字有黑圈阳文和黑底白文（外加黑圈）两种格式，《尔雅注疏》“疏”字多黑底白文（多外加黑圈，偶无黑圈），少黑圈阳文。嘉靖重校补版时盖有见于《尔雅注疏》和《周易兼义》的情况，参考了宋八行本格式，统一改用黑底白文且外加黑圈的“疏”字。

④杨按：按此处为引何晏注，何注作“颜”，自当以“颜”为是，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不误。阮元《校勘记》疑此“闻”与下文“颜回任道”之“颜”互易而讹。

⑤杨按：“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库本同，阮元《校勘记》：“十行本‘幬’误‘寿’。”蜀大字本作“煮”，贾公彦《周礼·师氏》疏亦作“煮”，唐宋时煮与幬义通。

版补“与”字；^①卷五第五叶为正德十六年补版，原左半叶有十五处墨钉，嘉靖重校修版全部补上了阙字；类似情况亦多见于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之《周易兼义》《毛诗注疏》《礼记注疏》等的嘉靖重校修版。更改文字讹误，如《论语注疏解经》卷六“子华使于齐”章“齐旧四量豆区釜钟”，正德十二年补版“豆”误作“斗”，嘉靖重校修版更作“豆”；同卷“觚不觚”章疏文“异义韩诗说”，正德十二年补版“说”误“为”，嘉靖重校修版更作“说”；同卷“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章孔注“将自投下”，正德十二年补版“将”误作“得”，嘉靖重校修版更作“将”；等等。可见，嘉靖重校修补对原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校改，因此在版式上表现了较明确的划一意识和区分意识，甚至意味着这次修版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也表明它在嘉靖三年补版之后在版式和文字内容上有了新的进展。

当然，嘉靖重校修补有一些元版、明正德补版的错误仍然沿袭，也不可避免地新增了一些文字讹误。如仅《论语注疏解经》卷一《学而》篇，嘉靖重校补版至少有四处讹误：“吾日三省吾身”章疏文“弟子曾参尝曰”，嘉靖重校补版“弟”误作“曾”；“道千乘之国”章疏文“以方百里者一为方十里者百”，嘉靖重校补版“十”误作“千”；同章疏文“州建百里之国三十”，嘉靖重校补版“三”误作“二”；“慎终追远”章疏文“言君能行此慎终、追远二者”，嘉靖重校补版“能”误作“子”。此四处元十行原版皆同宋蜀大字本和玉海堂本，不误。

将李元阳本与国图本、台湾“国图本”和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相校，国图本和台湾“国图本”属于元刻明正德十六年修补本，北京市文物局本属于嘉靖重校修补本，李元阳本文字基本与嘉靖重校修补本相同。嘉靖重校修补本对元十行本、正德三次补版的弥补和改正之处，李元阳本皆同于嘉靖重校修补本；嘉靖重校修补本保留的正德补版的墨钉，李元阳本也多作墨钉；嘉靖重校修补本新增的一些文字讹误，李元阳本大多继承了下来。程苏东曾撰文考定元十行本在明代的递修地点并不在南京的国子监，而是在福建的福州府学，^②称“南雍本”“南监本”是错误的。元十行本嘉靖重校补版的刊工与李元阳福州府学刻本的刊工多有相同者，元十行本嘉靖重校修补的时间略早于李元阳本的刊刻，那么，李元阳本当以元十行本的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刊刻时间在嘉靖十五年至十七年五月李元阳以御史巡按福建期间，所以他在嘉靖二十年前后所撰的《默游园记》中云默游园中储有“在闽中刻《十三经注疏》、杜氏《通典》及纂得群书三千馀卷”^③。

二、李元阳本在版式、行款上的创新与发展

李元阳本在版式和行款上对底本进行了较大改进，可以说有很大的创新和发展，对此后的北监本、毛本乃至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均有影响，值得加以专门论述。

具体来讲，李元阳本在版式和行款上的改进有：

① 宋、元十行本多有书耳，左右双边，白口，顺双黑鱼尾，偶有四周单边，黑口，对双黑鱼尾，版心中间刻书名和卷次，元十行本版心上方刻大小字数、下方刻刊工名；明正德六年补版多四周双边，其他正德、嘉靖补版多四周单边，白口或黑口，版心中间刻书名和卷次，多顺双黑鱼尾，版心上方多刻补刻时间、下方刻刊工，嘉靖重校补版全部为对双黑鱼尾，版心上方刻校人名、下方刻刊工名，无书耳。宋十行本、元十行本与正德、嘉靖补版版式上虽然有前后发展的关系，但各有特点，所以在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中版式颇不一致。李元阳本版式统一为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中间刻书名和卷次，下方刻刊工名，在继承嘉靖重校补版版式的基础上第一次做到了版式统一。

^① 杨按：“论”字，闽本作空格，自监本始补“论”字。

^② 程苏东：《“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修补汇印地点考辨》，《文献》2013年第2期。

^③ 李元阳：《默游园记》，《李元阳集·散文》，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② 宋、元十行本和明代补版多半叶十行，大字十八字或十九字，小字二十三字，但《尔雅注疏》半叶九行，小字二十二字，虽然人们称之为“十行本”，实际上名实不副，所以嘉庆年间阮元重刊《十三经注疏》时于《尔雅注疏》转用黄丕烈家藏宋刊单疏本配元刊雪窗书院《尔雅注》重新合刻。李元阳本版式统一为半叶九行，经文大字单行，注文中文单行，疏文小字双行，大字、中字、小字均二十一字。对此，汪绍楹、王锸等人均认为是在《尔雅注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①杨按：宋人刻《十三经注疏》有八行本、十行本之别，八行本为监本或蜀本，校勘较精，十行本为福建坊刻，讹误较多，元十行本为宋十行之覆刻，《尔雅注疏》版本来源不详。李元阳本统一调整为九行，与《尔雅注疏》行数相同，可能也受其他版式的影响，其经、注、疏分别用大、中、小字眉目清晰，后北监本、毛本、殿本皆承此例。

③ 宋、元十行本及正德三次补版经文大字，注文和疏文均小字，经注与疏文之间普遍有大“疏”字隔开，“疏”字多黑圈阳文，偶黑底白文（或外加黑圈或不加），嘉靖重校补版“疏”字全部用黑底白文外加黑圈，十分直观醒目。李元阳本经文大字，经文下注文前有领起的黑底白文外加黑圈的大“注”字，注文下疏文有领起的黑底白文外加黑圈的大“疏”字，疏文中经疏之下的注疏领起字“注”亦黑底白文外加黑圈，经、注、疏有字体的区别，又有醒目的领起字标识，疏中经疏与注疏也以领起字区分，十分显豁，类例详尽完备，后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均承此。李元阳本大“疏”字格式是继承嘉靖重校补版的全面化、完善化。宋、元十行本注文前均无“注”字，汪绍楹曾指出宋八行本《周礼疏》于经下注文前冠以“注”字，^②但仅一本，李元阳本注文前均标黑底白文外加黑圈的大“注”字也有可能是在嘉靖重校补版“疏”字的启发下补刻了“注”字，其将注文刻成中号字有严格区分经、注、疏的用意，尤其李元阳本疏文中的注疏领起字“注”字刻为黑底白文外加黑圈，也促使他在经下注前补出“注”字。

④ 除去《尔雅注疏》外，宋、元十行本、明代补版均正文顶格，章章相连，并不错行；《尔雅注疏》按条分段，每条经文首行另起顶格，经文下与双行注文相连，若注文延至次行则低一格，疏文均错行另起，也低一格。李元阳本按章分段，每章首行经文另起顶格，之后每行文字均低一格，章章分明；^③其《尔雅注疏》按条分列，每条另起顶格，疏文不再错行另起，而是连接在注文之下。应该说，李元阳本的格式是在《尔雅注疏》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也可能参考了一些写本的格式，^④并对《尔雅注疏》作了改进，使之与其他经疏行款一致。

李元阳本版刻体例在综合宋元诸本的基础上更加区分清晰，类例详尽，做到了直观化、整齐化，这是注疏版式、行款发展完善的结果，在经籍版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李元阳本的这种格式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也赢得了市场，其体式影响了北监本、毛本、殿本、库本等。

三、李元阳本的文字校正成果

元十行本《论语注疏解经》有一些文字讹误和脱文的情况，嘉靖重校修补本曾经作了一些校正工作，改正了不少讹误，对正德六年和十六年补版的墨钉作了部分的弥补，但是也新增了一些错误。李元阳本以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补本为底本进行重刊，基本继承了嘉靖重校修补本的校正成果，也沿袭了

① 汪绍楹：《阮氏重刻十三经注疏考》，《文史》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王锸：《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未刊稿）。

② 汪绍楹：《阮氏重刻十三经注疏考》，《文史》第三辑。

③ 杨按：闽本根据各经内容分段也不一致，其中《礼记注疏》《孝经注疏》《论语注疏》《孟子注疏》按章分段，《周易兼义》按卦分段，《尚书注疏》按篇分段，《毛诗注疏》按诗分段，《周礼注疏》按职官分段，《仪礼注疏》按篇分段，《左传注疏》《公羊传注疏》《穀梁传注疏》按条分段。

④ 许建平：《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第七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9月15日—17日）曾指出敦煌本《左传集解》每条首行界栏外有“经”“传”字。

一些新增错误,但又作了不少增补和校正工作,值得人们加以重视。

元十行本原无墨钉,但传至明代其板片逐渐残损,正德六年、十六年补版均有墨钉,嘉靖重校修补时曾增补了不少文字,但仍有些地方阙如,李元阳本又作了新的增补:如《论语注疏解经》卷十四第十三叶为嘉靖重校补版,“子曰不逆诈”章经文下注文“孔曰先”和“能为贤”作墨钉,李元阳本补足了两处阙文;又卷十九第七叶为正德十六年补版,其中“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经注与疏文间“疏”字作大墨钉,嘉靖重校修版沿袭,李元阳本补了“疏”字;又下疏文“犹可踰也”“犹可踰越”“不可得而踰也”之三“踰”字,嘉靖重校修版皆沿袭正德十六年补版作墨钉,李元阳本均补上了“踰”字;又下疏文“人虽欲自绝”之“虽”字,嘉靖重校修版沿袭正德十六年补版作墨钉,李元阳本补上了“虽”字。李元阳本这些增补均与宋蜀大字本、宋八行本残卷和出于元代元贞本的玉海堂本相合,证明其增补是正确的。元十行本有的地方虽无墨钉,但细绎有脱文,李元阳本亦作了增补:如卷一第九叶疏文“好礼谓闲习礼容”原“好”下无“礼”字,嘉靖重校修补无增补,虽然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亦无“礼”字,但此据经文“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而言,自当有“礼”字,李元阳本补“礼”字是也,后监本、毛本、殿本、库本承之;卷二第九叶疏文“则民不服其上也”,元十行本、元刻明修本无“其”字,^①李元阳本据文例补之,当是,后监本、毛本、殿本、库本承之。

元十行本有一些文字讹误,嘉靖重校修补时未能改正,李元阳本加以改正:如元刻明修本《论语注疏解经·论语序》第二叶“萧望之字长倩”,元十行本原版误作“情”,嘉靖重校补版沿袭之,李元阳本改作“倩”;第四叶疏文“倡鲁诗论语”,元十行本原版误作“昌”,^②嘉靖重校补版沿袭之,李元阳本改作“倡”;第五叶疏文“年世未远”,元十行本“世”误作“出”,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世”;卷一第一叶疏文“学业稍成”,元十行本“学”误作“觉”,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学”;同叶疏文“则扞格而不胜”,元十行本“扞”误作“杆”,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扞”;第五叶疏文“于是树板幹而兴作”,元十行本“幹”误作“幹”,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幹”;卷二第一叶疏文“孔曰篇之大数”,元十行本“大”误作“夫”,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大”;第三叶疏文“今之人所谓孝者”,元十行本“今”误作“令”,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今”;同叶“言偃吴人字子游”,元十行本“子”误作“少”,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子”;第七叶疏文“今其言与此少异”,元十行本“今”误作“令”,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今”;第八叶疏文“为衡颈之间”,元十行本“间”误作“问”,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间”;同叶疏文“白虎通云”,元十行本“云”误作“示”,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云”;第九叶疏文“而白鱼入于王舟”,元十行本“入”误作“八”,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入”;第十叶“改正易服”,元十行本“改”误作“故”,嘉靖重校修补未改,李元阳本改作“改”。元十行本校对不精,讹误较多,嘉靖重校修补时作了校改,但相对有限,遗留较多,仅《论语序》和前两卷十七叶,闽本所改至少有十四处之多,闽本对元十行本的校改可见一斑。

有些地方元十行本原版不误,嘉靖重校修补本却出现了错误,李元阳本亦多加改正。如《论语序》第四叶疏文“以武帝末年遭巫蛊事”,嘉靖重校补版“末”误作“未”,元十行本不误,李元阳本改作“末”;同叶疏文“有俊才”,嘉靖重校补版“才”误作“寸”,元十行本不误,李元阳本改作“才”;同叶疏文“为校书郎”,嘉靖重校补版“郎”误作“即”,元十行本不误,李元阳本改作“郎”;第六叶注文“君能行此二者”,嘉靖重校补版“此”误作“比”,元十行本不误,李元阳本改作“此”;卷二第九叶疏文“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者”,嘉靖重校补版“直”误作“宜”,元十行本不误,李元阳本改为“直”;同叶疏文

^①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亦无,然据文意应有,闽本增补。

^②杨按:此“倡”字,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作“习”,阮元《校勘记》:《后汉书·包咸传》“昌”作“习”。

“庄严也”，嘉靖重校补版“庄”误作“莊”，元十行本不误，李元阳本改为“庄”。《论语序》和前两卷，嘉靖重校补版六叶，李元阳本校改其新增错误至少六处，其对嘉靖重校补版的校改亦可略见。

此外，元十行本偶有衍文，嘉靖重校修补未能改正，李元阳本删之，如元刻明修本《论语注疏解经》卷二第二叶疏文“注孔曰至溢也”，元十行本“孔”下衍“子”字，嘉靖重校修补本不改，李元阳本删之；第十叶疏文“注孔曰至无勇”，元十行本“孔”下衍“子”字，嘉靖重校修补本不改，李元阳本删之。又有元十行本不衍，嘉靖重校补版新增者，李元阳本删之者，如卷二第六叶注文“所见危者”，嘉靖重校补版“者”下重“者”字，元十行本不重，李元阳本删之。

将《论语注疏解经》的元刻明正德修补本、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与李元阳本全面比勘，类似的校正讹误、补脱删衍在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可见，李元阳本对元十行本的原版和明修版做了全面校勘，改正了许多讹误、墨钉和脱衍，这是李元阳本的一大功绩，也使李元阳本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对此，汪绍楹先生曾云：“且本中佳处，往往与宋本合（见《左传》《尔雅》校勘记），监本、毛本且从此出，固明刊之佼者。”^①

四、李元阳本的新增文字讹误

李元阳本校改了底本的许多讹误，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新增错误。张丽娟在《明李元阳本〈春秋穀梁注疏〉浅探》中指出李元阳本《春秋穀梁注疏》有误刻和误改的情况，^②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也存在类似情况。

李元阳本误刻之例：李元阳本《论语序》第二叶疏文“東海兰陵人也”，“東”为“东”之形误，元十行本、嘉靖重校补版均不误；第四叶疏文“篇篇或异”，“篇篇”为“篇第”之误，下“篇”字蒙上“篇”字误刻，元十行本、嘉靖重校补版均不误；卷一第一叶疏文“当第子论撰之时”，“第”为“弟”之误，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云“闽本‘弟’误‘第’”，元十行本、嘉靖重校补版均不误；第五叶“合成方千里者九百”之“千”字当为“十”之误，疏文前言“以方百里者一为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则为方百里者九”，以百里之长乘方恰为十里之长乘方的百倍，则“方百里者九”当合“方十里里者九百”，后北监本、毛本均沿袭李元阳本误作“千”，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云“闽本、北监本、毛本‘十’误‘千’”；第十一叶疏文“言学者之志乐道忘饑”，“饑”为“飢”之误，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云“案《说文》‘谷不熟为饑’，‘飢，饿也’，则字当作‘飢’”，元十行本不误；卷二第三叶经文“父母唯其疾之忧”，“毋”为“母”之形讹，此章注文、疏文之“母”字李元阳本均误作“毋”；第八叶疏文“多见阙殆慎言其餘”，“言”为“行”之误，元十行本不误；第十一叶疏文“加軫與轡七寸”，“與”为“与”之误，元十行本不误；第十三叶疏文“故礼纬稽命殷云”，“殷”为“徵”之误，按“礼纬稽命徵”为纬书名，唐宋时尚未亡佚，蜀大字本、元十行本、玉海堂本并作“徵”；同叶疏文“秦誓言武王伐纣”，“秦”为“泰”之误，元十行本不误。这些讹误多因字形相近、读音相近而误，也有的是因上下文而误，属于张丽娟所说的“主要出自自写工刻工无意之讹”。^③

上文提到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据文意、文例于卷一第九叶疏文补“礼”字、卷二第九叶疏文补“其”字，后监本、毛本、殿本、库本承之而补，确实符合邢疏体例，意思优长，令人心浹，但是并没有什么版本依据，如今存宋蜀大字本和出自元代元贞本的玉海堂本也无此二字。而有的时候，李元阳本

^①汪绍楹：《阮氏重刻十三经注疏考》，《文史》第三辑。

^②张丽娟：《明李元阳本〈春秋穀梁注疏〉浅探》，《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8—99页。

^③张丽娟：《明李元阳本〈春秋穀梁注疏〉浅探》，《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九辑），第98页。

的增补就似是而非,甚至是太过武断了。如卷一第四叶注文“作使民必以其时”,李元阳本于“作”下增“事”字,虽然后来北监本、毛本、殿本、库本承之亦有“事”字,但此处所增非是。今按:宋蜀大字本、元十行本、元刻明嘉靖重校修补本、阮校本、玉海堂本无“事”字,又盱郡本、正平本、纂图本均无“事”字,则原应无“事”字。包咸以“作使民必以其时”释经文“使民以时”,“作”役使也,汉唐传注多见,“作”与“使”为同义词连用,“作”下增“事”属增字为训。又此下邢疏引包注及疏文均原无“事”字,自李元阳本始疏文均增“事”字,以致包咸注之本义湮没。又如卷三第十四叶疏文“告朔视朔听朔朝庙朝享朝正二礼各有三名”中“朝享朝正”四字,李元阳本作“享庙正”。今按:元十行本“享”上脱“朝”字,作“享朝正”,不辞,与“二礼各有三名”(即三“朔”三“朝”)不合。李元阳本盖因上文“朝庙”而改“享朝”为“享庙”以与之合,后北监本、毛本承之,清武英殿本、库本又承北监本于“朝庙”下增“朝”字以凑足三名,掩盖了最初脱文的痕迹。今蜀大字本、玉海堂本作“告朔视朔听朔朝庙朝享朝正”,可证李元阳本所改非是。又如卷五第三叶疏文“此章明仁不须佞也”,李元阳本“仁”作“口”,后北监本、毛本承之,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云“闽本、北监本、毛本‘仁’误‘口’”,蜀大字本、元十行本、玉海堂本作“仁”,此处为章旨,孔子用贬弃佞来推尊仁、釐清仁,李元阳本之改于仁疏矣。

如果说李元阳本的误刻属于写工刊工粗心所致,那么李元阳本的误改多为根据文意、文例的有意更改。由于李元阳本的误改往往表面上文从字顺,其不足不易察觉,这是北监本、毛本甚至是殿本、库本沿袭其改动的原因;但是,李元阳本误改并没有版本依据,尤其是在内容和语言上与原文有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逾越了文献校勘的原则,今天人们整理经籍使用李元阳本尤应慎重对待。

五、李元阳本的影响与价值

在元十行本之明嘉靖重校修补本的基础上,李元阳本《论语注疏解经》在版式、行款作了统一和完善,在文字校改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和其刊刻的《十三经注疏》的其他经书一致,极大地完善了经注疏合刻本,形成了一种在版式、行款和文字内容上全新的“十三经注疏”汇刻文本,在我国经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此后,明万历年间李长春主持北京国子监刊刻《十三经注疏》就直接翻刻李元阳本;后崇祯年间毛氏汲古阁本又翻刻万历北监本,实际上也是继承了李元阳本。北监本、毛本在版式、行款上与李元阳本颇为相似,文字内容也基本承袭李元阳本。清乾隆初年武英殿刊刻《十三经注疏》,其《论语注疏解经》以明代北监本为基础,再掺入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论语》部分,其版式、行款和文字也可溯源至李元阳本。

清嘉庆十九年,阮元重刊《十三经注疏》于南昌府学,其《论语注疏解经》以十行本的元刻明正德十六年修补本为底本,无《释文》,但嘉庆初年阮元撰《论语注疏校勘记》曾利用李元阳本和北监本、毛本进行校勘,指出了“元十行本”颇多讹误;阮元南昌府学本出现之后,阮刻本进行过多次校正,也是多依据李元阳本,李元阳本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论语》注疏本,由宋至今的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一是南宋刻蜀大字本《论语注疏》十卷,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中华学艺社1929年曾借以珂罗版印刷,后线装书局2001年又以线装影印,八行,附《释文》,但颇有些残损,另外也有少量的文字讹误;二是杨守敬自日本带回的元贞本《论语注疏解经》十卷,出自金元平水本,为日本幕府时期名医曲直濑正琳(1565—1611)家族用书,后光绪三十三年刘世珩交由黄冈陶子麟覆刻,是为玉海堂本,相对完整,也有少量的文字讹误;三是元十行本《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到明代出现了递修本,再到李元阳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库本,以及阮刻本,一脉相承。此外,今天尚有宋八行《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本之后十卷存世。蜀大字本与宋八行本、元十行本和玉海堂本都有些不同,属于另外一个体系。宋八行本与玉海堂本和元十行本系统关系较近,文字

较为一致,可以逆推元十行本出自宋十行本,宋十行本出自宋八行本,元十行本的许多文字讹误脱漏可以溯源于宋八行本。十行本属于坊刻,文字讹误较八行本有所增加,李元阳本是元十行本一次比较全面的校改,成果值得肯定,殿本是又一次全面的校改,成就也比较大。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本只是据阮刻本标点,没有参考李元阳本,许多错误都没有指出和改正。北京大学《儒藏》本据宋蜀大字本点校,要优于阮刻本,但是也没有参考李元阳本,蜀大字本的不足和错误没有改正。可见,近年来李元阳本的校勘价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李元阳本的误改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高峰)

An Examination of Li Yuanyang's Edition of *Lunyu Zhushu Jiejing*

YANG Xin-xun

Abstract: Li Yuanyang's edition of *Lunyu Zhushu Jiejing* 论语注疏解经(*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hich was produced in Emperor Jiajing's Rein of the Ming Dynasty, actually derived from the repaired edition of the Yuan Dynasty's ten-line version of the book.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s. Firstly, it has made some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in typographical format and style, such as the nine-line layout in a half page; big characters for the text itself; middle characters for the notes; and small characters for commentaries which are printed in double rows. That is, three types of writings, i.e. the text, notes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text ar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rom each other typographically. Secondly, i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offering comprehensive corrections of the mistakes in its previous editions, including Yuan Dynasty's ten-line version and the editions produced in Emperors Zhengde's and Jiajing's reigns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Li's edition also has some mistakes, and the misguided revisions Li offered were mostly made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or structure of the book and thus are not easy to detect. In spite of this, Li Yuanyang's edition has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editions and versions of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 including the Northern Imperial College's edition, Maojin's edition, Wuyingdian's edition, and *Sikuquanshu*'s version.

Key words: Li Yuanyang's edition; repaired edition of Yuan ten-line version in Jiajing's Reign; correction; misguided revision